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一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八〇期 ——
（二〇〇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2 0 1 d）

【往事追忆】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	王 海
【身不由己】“九一三”事件亲历记	宋德全
【前朝旧事】“我对林家无怨恨”	
——和林彪前未婚儿媳张宁谈九一三事件	蔡咏梅
【抢救文物】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	• 康松乔 • 邢邦明 • 阿勇
【小心求证】知情人反复查证林彪死因	肖思科
【史实辨析】周总理处置“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一些情况	于 南
【史实辨析】是周恩来不让外逃的林彪返回着陆？	周敬青
【发微探幽】“九一三”事件余波——周恩来嚎啕大哭	周秉德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 t t p : / / W w w . c n d . o r g / c r](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请在 s u b j e c t 中标明 C R 字样。

【往事追忆】

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

• 王 海 •

离开空五军到空军司令部军训部任职，对我来说，在一定意义上是脱离“苦海

”。在空五军，陈励耘、王维国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我进行没完没了的批斗，虽然令我精神上很受压抑，但说实话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曾和爱人商量过，就是一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绝不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大不了最后回家拉排子车去。其实，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这种所谓的“政治运动”无理剥夺了我进行正常工作的权利。应当讲，我正当盛年，党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我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正是我为党的事业工作、为空军部队建设效力的时候，却被无休止的批判捆住了手脚，不让干工作，真是欲罢不忍，欲干不能，精神上很痛苦。因此，离开空五军这个是非之地，当时真感觉到是一种解脱。后来我才知道，我得离开空五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京空军司令员刘懋功。刘懋功是一位陕北老红军。他为人正直，很爱才。“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次他到北京来汇报南空的运动情况。出于爱护和保护干部的考虑，他在汇报时，向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反映意见说：得想办法把王海调出空五军，要不然，闹不好，七斗八斗，可能把王海斗死。由于刘懋功是当面向吴法宪讲的，引起了他的注意，才有了把我调到空军司令部的安排。

但是，在全国都陷入“文革”狂潮的形势下，空军领导机关也不是世外桃源，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直接插手，这里甚至可以说是林彪一伙反党篡军活动的“重灾区”。到北京后，我很想扎扎实实做一点儿工作，抓好部队的军事训练，挽回在空五军耽误的时间，但实际上却很难摆脱“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干扰。

在“文革”的纷乱中，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1971年的初秋季节。记得是9月上旬，空军召开了一个院校工作会议，研究院校训练工作。会议结束后，9月12日，我按照原定计划带了几个同志去天津杨村机场下部队了解情况。第二天，也就是9月13日，吃完早饭，突然接到空军司令部通知，要我立即赶回北京开会，司令部还派了一辆车来杨村接我。二话没说，我马上往回赶。通知是9时开会。

当时，杨村到北京的路很不好走，匆匆忙忙赶到司令部时会议已经开始。参加会议的都是司令部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司令部的一位副参谋长在会上口头传达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9月13日凌晨，林彪等人乘三叉戟飞机从北戴河叛逃出国到蒙古摔下来了。会议很简短，传达完就散会了。会场里静静的，没有人说话。这有点儿像大暴风雨前短暂的寂静，又有点儿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把人震蒙了。但从人们强作平静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每个人心头都掀起了一股冲天巨澜。

我立即联想起，在杨村机场时，部队的一位同志曾告诉我，9月12日夜，他们在雷达上观测到，有一架飞机从北戴河起飞，朝蒙古方向飞去，并越过了边境，在蒙古温都尔汗一带从屏幕上消失了。显然，他们看到的就是林彪那架飞机。看来，这件事确凿无疑。

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心中暗暗庆幸。这个革命口号喊得最响、自封为毛主席接班人的林彪，终于露出了篡党夺权、反对毛主席的真面目。我

感到高兴，不完全是个人原因，我虽然在空五军被扣上了反对林副主席的帽子，但我与林彪并没有直接接触过，关键是我对“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一些现象感到很不理解。现在林彪的问题终于暴露出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文革”中压在我心头的一个大疑问：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文革”为什么变成了大动乱，变成了对大批老干部的乱批乱斗？过去我总觉得不对头，私下里认为，党内肯定在一些事情上出了问题，一定有坏人乘机作乱。但到底是怎么回事，总是弄不明白。现在终于清楚了。林彪阴谋败露，折戟沉沙，对我们党是一件大好事，当然，对我个人也是一件大好事。听完传达，我顿感心中豁然开朗。

几天后，司令部又就此事组织了一次传达。我记得很清楚，第二次传达是在司令部办公楼的走廊上临时召开的。这次传达的范围比较大一点，二级部副部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传达完以后，大多数同志都很高兴，也有一些同志表示难以相信。我们司令部气象局有一位副局长听完传达后就说：我不相信，林副主席对毛主席最忠诚，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在当时特殊的情境下，听他讲出这一番不合时宜的话，我心里又生气又替他担心。气的是，林彪叛党叛国，事实俱在，还有什么不相信的？担心的是，有些人中林彪的毒很深，如果现在还执迷不悟，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当时，我情绪非常激动，一时控制不住，就走过去，扇了他两个耳光。

因为当时在场的人情绪都比较激动，对我这种冲动的反应，司令部的领导也没有当面提出批评。但是散会以后，冷静下来一想，我觉得自己这种举动实在不妥，太不冷静，不带劲儿，对不起同志，非常后悔。下班后，我特意在办公大楼下面等这位同志，向他当面道歉。这位同志很好，不仅痛快地接受了我的歉意，还真诚地说：哎，没关系，你打得好，这个耳光把我打清醒了。这个事情后来一直传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批评了我。他说，告诉王海同志不要这样，有的人可能这个弯转不过来，不要急，可以等待。总理又说，告诉王海同志，不要打人。周总理这种政治家的宏大气度深深地教育了我。这件事我终生难忘。

周总理的批评我是在吴法宪的办公室听到的。吴法宪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死党之一，他被隔离审查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十几天以后。在吴法宪被隔离审查前几天，有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见面后他对我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了他一些照片，叫他在空军组织一些专家，根据这些照片分析一下，林彪的飞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被外部炮火击落的呢，还是发生过机内搏斗？究竟是什么原因坠落的？

照片有好几十张，在他的办公桌上摊了一大堆。我正在看照片，来了一个电话，电话是周总理打来的。话筒声音很大，吴法宪接电话，我站在旁边也听到了周总理的声音。周总理问吴法宪空军的情况。吴法宪说，现在文件已经传达了，但是有的人不相信，我们这儿就有个气象局副局长不相信，王海冲动了，打了人家两个耳光。接着周总理就讲了上面提到的那番话。

事过很久以后，我见到海军政委李耀文，他曾当过外交部副部长，负责亚洲事

务，交谈起来，才搞清了当年这件事情的原委。李耀文告诉我，当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找吴法宪谈话，他也在场。周总理要吴法宪汇报一下256号三叉戟飞机失事的情况。吴法宪心中害怕，吞吞吐吐，讲不出个究竟，就推说不知道。周总理严厉批评了吴法宪，说，你到现在和党还不是一条心。随后，周总理交给吴法宪一些照片，交待他到空军找一些真正懂技术的人，对飞机失事原因进行仔细的研究。于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我牵头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承担这项任务。这个空军专家组的成员还有当时的空司机务部副部长何培元、空政组织部副部长陆德荣、空司军训部副处长王季南、王涛和空司机务部参谋赵汉立、金华。后来，公安部的几位同志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由于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地点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事发后赴现场勘查已不可能，因此，专家组的工作主要是在国内对照片和实物反复进行对比辨别、分析研究。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掌握的这一批照片非常逼真地展现了飞机失事现场的情况。提供这批照片的，是当时我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一位武官，名叫孙一先。温都尔汗是一片人烟稀少的戈壁。256号三叉戟坠落后有一段时间无人知晓，因此失事现场保存了原样，基本没有受到人为破坏。孙一先在得知消息后较早赶到了现场，通过他的照相机镜头给历史留下了这批极其重要的资料。

当时，与256号三叉戟飞机同型号的飞机，我们空军还有十几架，在进行失事原因查勘时，这些飞机成为可资对比鉴别的重要实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个专家组频繁往来于空军司令部与西郊机场之间，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比照、核实与分析。我们专家组的每一位同志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我们知道，此事责任重大。搞清事实真相，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任，更重要的是还有非常现实的政治意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特别是“文革”期间，由于个人崇拜盛行，林彪作为“副统帅”在毛主席的光芒下神化自己，欺骗、蒙蔽了许多群众。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工作，以严谨的科学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把林彪一伙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真实情况调查清楚，昭示于天下，这将有助于广大人民群众尽快认清林彪一伙的真面目，彻底肃清他们的反动影响。

根据大量有效的证据和各方面情况的综合分析，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的情景在我们眼前逐渐变得清晰起来。首先，我们排除了一些外间广为流传的说法。其一，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该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我们在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失事现场，有一道相当长且清晰的轨迹，这显然是飞机在地面高速滑行时留下的；飞机的残骸散布呈带状，比较集中，根据测算，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碎片抛落地面，其散布面会很广，甚至可以抛落到十几公里乃至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机上人员的尸体也散布在一小片面积内，而且形状清晰可辨，如果从高空坠落，不可能呈现此种状态；另外，飞机若是在空中起火，机上燃料很快会在空中散掉，不会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样形成地面大面积燃烧的痕迹。其二，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除上述根据外，大量证据显示，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机身上引起种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燃烧爆炸时形成的。其三，飞机坠毁前机内没有发生过搏斗。机上三个机械师没有带枪的可能，他们知道飞机是未经

批准强行起飞，但并不知道飞机要去哪里，不可能知道此行是林彪叛党叛国，因此不会允许他们携带武器；驾驶员潘景寅当时也不可能进行了搏斗，这一点可从他当时的政治和现实思想情况及飞机起飞前后的情况判断出来。9月12日深夜，林彪一伙是仓皇出逃的，登机时没有正常舷梯，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的，这些情况驾驶员当然清楚。林彪一伙登机后，驾驶员没有得到航管部门的指令就匆匆开车，飞机先滑入草地，以后转入滑行道，然后强行起飞，由于操作慌乱，256号飞机的机翼航行灯撞到了加油车的加油口上。这有事后在山海关机场捡到的256号飞机航行灯玻璃碎片为证。这一切都是驾驶员自觉所为，他当然也就不可能随后在飞机上进行搏斗。

那么，9月13日凌晨256号三叉戟飞机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们根据大量证据认定：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粉碎烧毁的。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行员没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这一切都表明，256号飞机当时是在飞行员有效控制之下，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256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其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极易造成油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其三，当时飞机仓促起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

我们认为，当时256号飞机之所以要在温都尔汗实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因为该机油料不够。这架飞机是仓促起飞，准备工作不充份，没有加满油料；在外逃时该机又长期在2500～6500米高度飞行，低中空飞行耗油量大，到失事地点前后油料已感不足，因此被迫进行野外降落。

另外，因为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又没有导航，当日恰逢暗夜，飞行员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确位置，飞机是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降落。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我们终于根据有限的资料，搞清了三叉戟飞机坠毁的真实原因，完成了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1972年5月19日，我们专家组根据查看和分析图片所得出的结论，向中央提交了报告。我们的上述看法都在这个报告中作了充份的阐述。

□ 摘自《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2月版

~~~~~

## 【身不由己】

### “九一三”事件亲历记

• 宋德全 •

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经过，中央文件已有明确表述。近年，不少知情官员、亲历者及外国记者也陆续从不同侧面披露了一些情况，进一步廓清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有利于消除某些议论和猜测。这里，我则从自身经历作些介绍。

1971年夏，林彪、叶群及随行人员从北京去北戴河，当时我因回东北搬家没有从行。8月初，我回北京后，将家属稍事安顿，就奉命做去北戴河的准备工作了。几天后，叶群从北戴河回北京“治病”。那几天，毛家湾热闹异常，许多人前来探望。从后来公布的材料看，那正是叶群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其夫人们频繁进行密谈之时。我同其他在家工作人员都以为是礼节性的探视。大约8、9日，我在办公室收拾东西，值班于秘书不在办公室，周恩来打来电话，问“是于秘书吗？”让代向叶群问候。我顺口回答：于秘书不在办公室，去接待客人了。周紧接着问：“是哪些客人？她（指叶群）是病人嘛，你们要照顾她少会客，好好休息。”当时我不知来者为谁，同时也不关心此事，遂答应向叶群报告总理的问候。从周恩来的问话可以觉察出他当时很关注林叶的活动。

我此次去北戴河后，同平时一样，事情不多。有时听听电话，多数时间用来看书。

9月上旬，在部份工作人员中传说要换住地。但究竟去哪里，何时动身，在北戴河的人员是否全部随行？始终没有听到正式安排。这里有个规矩，“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我来此时间不长，更是严守“三不”原则。

大约9月10日，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副科长刘××把我拉到僻静处，悄悄地对我说：“豆豆（林立衡）说，主任（叶群）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林彪）外逃，怎么办？”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继之又静了下来。我说：“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呢？或许是他们家庭内部问题。”我当时不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对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种种情况更缺乏了解，只是以前隐约听说豆豆与叶群关系不好。可是我又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当即与刘商定：一、此事事关重大，希望并支持豆豆向中央报告。二、刘注意外边动静，我留意办公室情况，有新情况，随时交换。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豆豆在什么范围内谈及此事，不敢轻易同其他秘书商量，豆豆也嘱咐刘千万不要扩散。

9月12日晚上，电影厅里在放映香港电影，我照例是不看的，仍在办公室。刘××告诉我，豆豆说林立果又逼她表态。他已陪豆豆到58楼向张副团长、姜大队长报告了这里的情况，并且做了布置，设计了几种应变方案。不大一会儿，林彪

的警卫李文普匆匆回到办公室，一边忙着办别的事情，一边让我立即给大连打电话，通知做好准备。电话刚接通，站在我旁边的刘××拿起话机刚要讲话，林立果进来，问是哪里电话？并立即将电话按断，说哪里也不要通知。随后，就匆匆出去了。

林立果、李文普出去后，我立即到外边告诉八三四一部队姜大队长说，看来马上去走。姜大队长直奔58楼。其实当时我们都很盲目，并不知道究竟要去哪里。反正要走，必须经过山海关机场。

平时“林办”行动，统由李文普调动，林彪车在前，叶群车紧跟，秘书及其他人员殿后。这次则一片混乱，事前无人通知，个人携带的东西都未作准备。听说要动，我们按惯例注视着叶群的车，不见启动，以为她仍在房间。忽然，林彪内勤小张气喘吁吁地跑上来说，主任（叶群）、老虎（林立果）他们都坐首长（林彪）的车跑了。这时我们才真正感到问题的严重。于是急忙唤上一名警卫部队的司机驾驶伏尔加车飞速紧追。车中有我同刘副科长、李秘书和小张。我忽然想到，四人之中仅有刘副科长是警卫人员，配带一支手枪，其余都是赤手空拳，遂在58楼前，拉上一名持长枪的战士，直奔山海关机场。虽然司机已开足了马力，我们还不断地催他加快速度。时间一秒一分地过去，轿车在黑暗中风驰电掣般急驶。途中，司机突然来个急刹车，由于车速太快，刹车过猛，拐了个“S”形，才在路旁停了下来。原来前边正有一列长长的货车驶过，我们的车停下来时已接近铁轨。若非司机年轻机敏，我们不是撞到火车上，便是翻到路边。事后很长时间，想起此时便不寒而栗，心有余悸。

我们赶到飞机场时，八三四一部队的警卫战士已稍前到了那里。这时机场一片黑暗，飞机已离开跑道起飞了。我们连喊“快开枪！快开枪！”但已无济于事了。当时我们埋怨警卫部队，为什么先到机场却不能阻止起飞？可是他们在未接到上级正式命令之前，谁敢枪击“副统帅”的座机呀！

至今，我常想，历史的偶然性在一个具体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实在是不可低估的。如果我们在追赶林彪一行的路上，不是遇到那长长的货车，能够提前两三分钟在他们爬上飞机前赶到，凭着我们当时对毛主席和林的感情（那时大家深信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挟持走的）是不会让飞机顺利起飞的（何况也就是在两三分钟后，山海关机场的海军部队也接到中央阻止起飞的电话命令），那将是另一种局面。再如果北戴河多几位像林豆豆那样知情、无畏者，提早向中央报告，这段历史也许会有不同的写法。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当然，有时我也想到自己。如果我们途中撞车或翻车，定死无疑，我们四人的结论将有许多麻烦。如果我们提前几分钟赶到机场，很可能发生冲突，出现差池，那也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后来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回想起来，都不寒而栗。这些年来，当我在生活中遇到荣辱得失，每念及此，也觉泰然了。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是也。

当从山海关机场乘车回到北戴河住地后，我们的境遇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这里

的工作人员变成被软禁的囚徒；警卫人员成了看守。我们在警卫部队的监视下，从办公室中带上毛巾牙具之类，其余一切封存。所有人员分男女集中在两个大房间中。在最初一段时间里，我们对警卫部队充满牢骚，这倒不是由于地位的变化所致，而是认为早已将情况报告中央和警卫部队，希望采取有效措施。部队办事不力，他们跑了，反而把我们看管起来。后来也想通了，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上级的正式命令，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的。

大约过了十来天，全体工作人员被押解回京，重返毛家湾。这里虽同家属只有一条马路之隔，却不能同他们联系。从此开始了四年软禁审查、三年劳动改造的生活。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向我们宣读了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11月，我们被移交给中央专案组，改由北京卫戍区看管，住地从毛家湾迁到西山亚洲青年学生疗养院（简称“亚疗”）。在“亚疗”初期，要敞着门睡觉，定时放风，不得与外边通信。后来稍有松动，可以给家属写信，但不能封口，经看守检查后由他们发出，来信也要检查。

在“亚疗”期间的任务是揭发批判林彪罪行，交待检查自己问题，接受中央专案组审查，以及接待外调来访，提供情况等。我所知道的情况一两天即可写完，有的内勤战士只来两三个月，不过是照顾林、叶生活或裱糊书画、图表等，就更没什么可写的了。经过一段揭发交待，大家无事可做，但是不能出去。我们向专案组反映，希望能有书读，这个要求总算得到了批准。一位工人出身的原团中央干部、专案组成员很理解我们，有时从市里给我们背来一些书。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很爱读书，人也随和，愿同我们聊天，并鼓励大家不要灰心，说将来出去以后，党还会信任你们的，是有前途的。虽然我们并不相信他的话，但还是很感激他的。后来，大约因为他“界限不清”而被调离专案组了。伴随我们到底的则是另外一位朱××

1972年冬，专案审查告一段落，我们以为可以获释了，不料又从“亚疗”转移到大兴团河劳改农场，改由公安部、中组部及某野战军等部门人员联合组成的领导小组监管。来此的，除“林办”现有工作人员之外，并将调离多年的老秘书一并拘了进来。此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陈伯达等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256号专机组和张宁等。我们这里的正式名称叫做“中央专案组团河学习班”。在此“学习”者，当然该称“学员”了。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学习班”实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名词，不可望文生义。我们的任务虽然也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项，但主要还是继续接受审查和接受劳动改造。

团河是个比“亚疗”更负盛名的地方。清朝在那里设有团河行宫。学习班的学员虽然不多，但成份复杂：有军、有政、有民，而多数是军人。军种齐备，来自海、陆、空。所有人员一律按部队编制，分成六个班，每天在军管人员带领下出操、劳动、学习。劳动科目有埋翻葡萄藤，为果树剪枝、收获，以及掏厕所、起猪圈等



除了参加劳动之外，随着全国“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等掀起一次次学习批判的高潮。

时间长了，并无什么事情可做，消磨时光而已。其实管理人员也不愿长期耗在那里，但是上级不说话，谁也不敢说学习班可以解散了。我们曾多次要求学习班领导小组如实向中央专案组反映这里的情况，尽早结束学习班，但都无结果。

直至1975年8月，学习班负责人向全体学员传达了毛泽东为“林办”一名工作人员上书的批示：“林办工作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应尽早分配工作，以观后效。”此时，中央专案组大有雷厉风行之势，立即要将我们打发走了事。说来也怪，关在学习班里，大家盼着快点出去，如今有了毛泽东的批示，许多人却不像专案组那么急了，纷纷向领导小组提出：你们关了我们好几年，总得有个说法，下个结论吧！专案组本来似乎没有给每个人做结论的考虑。这个要求反映上去以后，专案组学习班很快给每个人做了结论。结论分三等：一是犯了政治性错误；二是犯了错误；三是属一般工作关系。其标准大约是工作时间长或牵扯多一点的为第一类，一般勤杂人员属第三类，其余均为第二类。二、三类占多数。最后都加了尾巴“以观后效”云云。在个人签字时，多数人对这种宁“左”勿右的结论表示不理解。经过几年的审查，专案组对每个人的情况了如指掌，绝大多数人属工作关系，许多人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政治觉悟并不比谁低，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站在党中央毛主席一边，凭什么在结论上非留个尾巴不可？这样处理，对在位中央首长的秘书会有什么影响？等等。学习班分管“林办”的朱××威胁说：“你们不签字也可以。但要考虑出去以后的工作分配问题！何况你们不签字也照样处理，是可以认定的。”多数人认为反正出去以后不会有什么好出路，便签了字。也有人始终没有签字。出去以后，方知分配原则早已直插到基层。军龄长者，到边远地区县武装部；军龄短者，立即转业到地方；均控制使用。

关于“林办”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写信一事，后来获知，其过程大致是这样：周恩来曾关照此事。向北京医院领导问过，蒋医生（林彪保健医生）怎么还没出来？此事应能传到专案组那里，但无结果。后来，汪东兴询及此事。这位医生冒着危险写信给毛泽东，经汪东兴之手送到。毛泽东接到此信后，很快作了上面的批示。遵照批示精神，不仅“林办”，其他各“办”，乃至类似的受审人员陆续获释。就“团河学习班”的结束这件事来说，如无周恩来、汪东兴的关照，毛泽东的批示，还不知延续到何年何月。

回过头来，再说获释后的情况。当时我还有幻想，希望留在军队科研部门或院校，如军事科学院、政治学院、军事学院等，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然而总政管调配的人说：立即去沈阳军区报到。分配方案是经总政首长张春桥批准的，没有商量余地。此后，一路上便是连续更换介绍信，一切免谈。从沈阳军区到吉林省军区，办理转业手续后，到省委组织部，到省重工业厅，到长春拖拉机厂。工厂管人事

的同志说：上边指示，保留干部编制，下放车间劳动。于是，我被安排到总装车间，成了一名装配工人。轰鸣的车间，繁重的劳动，杂乱无章的集体宿舍，都使我感到不适应，但我毕竟又是自由人了。从工厂党委书记到车间书记主任、班组工人，对我都很同情，并无歧视，没有见过从专案组、总政治部到省委组织部那种冷漠的面孔。厂党委书记在50年代是省里某地委书记，1959年因犯右倾错误，下放到这个厂子当党委书记，他几次到我们这个班组参加劳动，曾指着我对一位女青工说，这个人最倒霉了。这位青工很快把话传给我。这在那个时代已很令我感动了。

1977年冬，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以后，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局面。我也觉得有了一线希望。我所在车间党支部书记是位转业兵，对我这个穿过军装的人多一份同情，他说，上边对你的工作安排不合适，我们车间和厂子无能为力，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你应该上诉。后来，我分别给党中央、总政治部、吉林省委等部门写了报告，要求重新考虑对我的工作安排。报告寄出以后，很长时间没有下文。

1978年初，工厂中的一位朋友（从前我在东北文史研究所的同事）高兴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有希望回研究所了。佟老（佟冬，原东北文史研究所所长，当时为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在省里召开的批判林彪‘四人帮’在吉林省代理人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到了你。他说当初王淮湘（六十军军长、吉林省革委会主任）、药天禄（六十军政委、吉林省革委会副主任）把你从文史研究所选送到‘林办’，现在你回来了，他们为了保自己，把你打发到工厂改造，不许回研究所。”我听了之后，自然十分高兴。过了不久，我从长春拖拉机厂调到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今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参加《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的编辑工作。于是我在“林办”及因之而受审、劳改前后达9年半的经历至此结束。

中央专案组团河学习班审查结论中的不实之词，一直未予撤销，仍然装在我的档案袋中。直至1981年10月，收到原单位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临时委员会于10月5日所做的复查结论，内称：“经复查，宋德全同志在原‘林办’工作期间，主要是为林彪、叶群查书、编资料，属于工作关系。撤销中央专案组团河学习班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关于宋德全同志的审查结论》。”1982年6月，军委办公厅政治部送来公函称：“根据中发〔1982〕9号文件精神，现将从你档案中清出的检查材料退你，请查收。军委办公厅政治部，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五日”。至此，我这个并不复杂的案子才算最后结束。从“九一三”事件算起，历时近十一年。撤销结论，退回“检查材料”已经表明在实际上纠正了以前对我所做的不当处理，但是没有哪一级组织对此表示道歉。尽管如此，比起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几十年后才得到平反、甚至到死都未予平反者，我还是幸运的。

□ 原载《百年潮》

~~~~~

【前朝旧事】

“我对林家无怨恨”
——和林彪前未婚儿媳张宁谈九一三事件

• 蔡咏梅 •

一九七一年林彪坠毁外蒙古温都尔汗的“九一三事件”对当时中国人精神的极大震撼，及整件事的神秘色彩，使我一直对林彪及其死亡之谜感到无穷兴趣。

意想不到的的是八月底我竟和九一三事件的一个重要当事人，林彪前未婚儿媳张宁在香港见了一面。

◇ 林彪案株连三十万人

张宁这位身世传奇的女子现已嫁作商人妇，丈夫林赛圃是美籍华人，在美做贸易生意。这次张宁在丈夫陪同下带着三岁的儿子经香港回大陆探亲。

大陆公布资料都说，当初林彪独子林立果选妃，最后相中张宁，不但是她人美，而且还很有气质风度。见到张宁，我好奇地打量她，已有些发胖，但仍然美艳，四十七岁的年纪风韵犹存，想像她年轻时一定美得灿然夺目。

据大陆一些资料透露，林彪一案株连之广相当惊人，受牵连者竟多达三十万人，绝大多数相当无辜，张宁是其中之一。张生于一九四九年，中共老红军的遗孤，当时是南京前线歌舞团的舞蹈员，她与林立果的结合，完全是不由自主。张宁说其实林家子女，包括林彪女儿林立衡与她的丈夫张青霖都不能像常人一样谈恋爱结婚，他们的婚姻是政治包办婚姻。

在组织安排下，单纯的张宁一九七一年六月进入林彪家庭时，距九一三事件仅三个月，在这短短三个月中，张宁身不由己地卷进中共权力斗争的风暴眼。她虽然侥幸未上林彪那架三叉戟，留得一条性命，但后来却饱受多年的苦难，先是被关押审查了整整四年，接著又长期受到“内控”。张宁回忆说，七一年十一月她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听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传达关于五十七号文件时，才知林彪全家已坠毁温都尔汗，想到自己竟然和这样一个“罪恶”的家庭联系在一起前途尽毁，痛不欲生下第二天即自杀，但被人救活。

◇ 林彪内外判若两人

她说，她很快明白这是制度问题，林彪父子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应以公平心来对待他们。

对于被大陆民众视为乱臣贼子的林彪，当年的未婚儿媳显然是很同情的。她说明这不是出于一种亲情，而是由于理解和认识。她见过林彪好几次，林彪的每一句

话，每一个动作她至今记忆犹新。“他人很含蓄，很内向，还很腼腆，是个虚弱的老人，感觉上也很亲切很好脾气，没有大首长的架子。”最使她吃惊的是林彪完全不像外面见到或外面宣传的样子，而是“内外判若两人”。

她认为林彪是位极优秀的军事家，但不是政治家，搞权术搞不过毛泽东，也搞不过周恩来，政治上表现最着力的就是文革，但就是这短短几年，林突然攀升到政治最高峰，但又倏忽间一跌到地，粉身碎骨，令人相当感慨。她说，“林彪对国家、民族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他也有身不由己的地方，有时他精神相当无奈相当痛苦，以后真相大白。我们会看到林彪也是个历史大悲剧人物。”

我问她对自己的未婚夫林立果怎样看？她沉思了一下说，林立果是同时代年轻人中的异数，思想超越了时代，在中共高干子弟中还没有一个地位如此高而思想如此反叛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许多批判毛泽东的话确实就是林立果当年对周围人所讲的，但据她所知，所谓的林立果小舰队并没有甚么成型的政治纲领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应是后来拼凑而成的。至于林彪的妻子叶群，坊间不少书都把她写得相当不堪。比如有本托名叶群一位女服务员王兰多（王的丈夫杨振纲是林彪的司机，与林彪一同摔死在蒙古荒漠）自传《叶群之谜》，大写叶群色诱秘书，与林彪手下大将黄永胜通奸。张宁说她认识王兰多，“小王文化低，人很老实”，这些情节是自传作者虚构编造的。“叶群精神空虚无聊，写几首诗给黄是可能的”，但黄永胜极其崇敬林彪，“他怎么会与他崇敬的首长的夫人上床？相信他也不敢。”

◇ 林豆豆不作母亲誓为父雪冤

在林氏家族中真正与张宁相交很深的是林立衡（小名林豆豆），两名孤女同是林氏灭门惨变的幸存者，感怀身世，同病相怜，相濡以沫，使她与林豆豆结下了深厚的姐妹之情。她一直称林豆豆为“姐姐”，称林豆豆丈夫张青霖为“哥哥”。

据后来逐渐披露的资料，林彪父女感情相当深厚，但林彪爱女林豆豆却举报父亲逃亡，在父母兄弟惨死后，这位大义灭亲的女儿难道不会感到痛悔吗？

深知林豆豆情况的张宁说，林豆豆和同时代年轻人一样，所受的教育使她崇拜毛泽东，相信中央，为了保护和挽救自己的父亲才向中央求助，但没有想到会铸下大错，林豆豆是真正“非常非常”后悔。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林豆豆立下誓愿，要用她后半生的全部生命为父亲雪冤，因此她决定不要孩子不当母亲。张宁说，林豆豆外表文弱，而且身体多病，但意志却相当坚强，绝非一个弱女子。二十五年来她一直未停止过向中央申诉，所拟的申诉提纲共八十三条，由于中央不接受，她曾通过关系在北京散发。

至于中共官方文件对林豆豆“大义灭亲”的嘉许，林豆豆从来不接受。张宁说，每次宣读中央文件，念到“大义灭亲”这样的词句，林豆豆就会失去控制，大声愤怒抗议中央盗用她的名义欺骗世人。

一九八〇年中共公审四人帮和林彪反革集团时，林豆豆多次向中央组织部写信，反对将四人帮案与林彪拉在一起，并要求出庭为指控林彪的有关每一件历史事件作出反证。公审前中组部曾派了三个人到郑州（林立衡七五年后和丈夫张青霖下放该市）听取林豆豆的意见，她谈了很多真相，这三个人大吃一惊，最后说，“如果你们谈的是事实，我们提著脑袋也要向中央反映。”后来林豆豆又向河南省委书记、省长、郑州市委书记谈了三天三夜。

张宁所讲的林豆豆一直对林彪案喊冤叫屈，大陆的报章也有同样报导，曾作叶群文学侍读的傅伟勋在他所写的《我所知道的叶群》即说林豆豆对审查态度相当不合作，先是拒绝交待问题，受到反复批判后，就大量交代林彪说毛泽东的坏话，后来又不断向中央申诉。

◇ 相信九一三事件是冤案

这一切是否证实一些人（包括笔者）所猜想，林彪九一三事件另有复杂的内幕，林彪根本就是一个冤案？对此张宁不置可否，似有难言之隐。但她强调，官方对九一三事件的说法有破绽漏洞，最近民间提出不少新的资料和看法，官方的态度也是很暧昧的。比如说官方指控林彪搞政变，“他一个国防部长，全党全国的副统帅，有忠于自己的军队，有手下铁杆干将，为甚么却只让他的儿子去搞？这不是很说不通吗？。”

张宁认为“在这一事件中，毛林周三角关系起了关键作用，毛确实想整林彪，但是否会把他逼上绝路，我看未必，不然毛为什么要说‘天要下雨’这样的话？为什么会在事件发生后受到很大的精神刺激？周恩来起了什么作用？大家可以去探究。”

张宁期待有一天真相会大白，这应该是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共同愿望。

~~~~~

#### 【抢救文物】

##### 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

• 康松乔 • 邢邦明 • 阿勇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山海关某机场。256号三叉戟载着仓惶出逃的林彪等9人起飞。约两个小时后，飞机坠毁在蒙古国肯特省温都尔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3”事件。二十多年后，内蒙古海拉尔市，“256”飞机残骸作为重要文物和历史物证被一位有心人悄然收购运到这里，并严密封存和收藏起来。

一九九八年杨柳吐翠季节，笔者专程赶赴海拉尔市，寻访残骸的下落，并了解到其被收藏的详细经过。

#### ◇ 众里寻他

一九九四年三月八日，美国《洛杉矶时报》称美国记者汉纳姆于一九九三年开始搜集有关“9 1 3”事件资料，在温都尔汗坠机现场看到：“飞机残骸成了狼窝，老鹰和秃鹫也在此安家落户”，“剩下的仅有一些支离破碎的条条块块了，最长的大约两英尺。”

同年，北京某传媒称林彪座机残骸被“一位不知姓名的港商买走”。一个港商“出高价买走了残骸的主要部份”。文章又说，“港商到底是谁？飞机残骸现在何处？是谁又倒卖给其他人？这些都已无人知晓、无从查找。”

“256”飞机残骸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杭州某报发表《林彪座机残骸将与世人见面》一文。石破天惊，多家报纸纷纷转发、转摘。一九九八年初，转发有关“2 5 6”残骸的报导达到顶峰。文中披露，内蒙古某边贸公司的邬经理收藏了包括完整的起落架、轮毂、发动机芯和外壳在内的林彪座机残骸。

不久，笔者来到靠近中蒙、中俄边境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市，当时唯一的线索是：收藏者姓邬，呼伦贝尔盟某边贸公司负责人。

寻找从毫无头绪的排查开始。我们几百个电话打出去，十几次出访探寻，仍然毫无进展。就在即将失望准备离开时，海拉尔奋斗乡一位王姓人氏听了原委后，想起曾在一个人手中见过一块“2 5 6”飞机的铭牌！

在王氏的帮助下，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邬经理”。

#### ◇ 温都尔汗：找到残骸

在笔者的再三恳求下，邬经理第一次在家中与笔者见面，此后十几天，邬经理陆续讲述了残骸的收藏经过。

“一九九一年七、八月份，我代表公司（指他所在的边贸公司）到蒙古肯特省温都尔汗洽谈贸易。一提温都尔汗心里就挺敏感：这不是林彪坠机的地方吗？我和当地政府官员联系，想到林彪出逃坠机的地点看看，结果被当地官员一口回绝。我被告知那里有专人看管，有铁丝网圈围，无法接近。”

邬经理再去温都尔汗已经是一九九三年三月了。当时，蒙古国内政局已经发生变化。邬经理听说“256”残骸已经没人管了，有人把飞机上的铝都抠下来卖了。邬经理很震惊。“913”事件是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256”残骸是一个重要历史物证，怎么能随意毁坏呢？他向蒙方官员达先生再次提出想看一看的要求。恰好一位美国记者（后得知是汉纳姆一行）也计划接触林彪座机残骸，达先生便同意了。

邬经理打出收购废旧钢铁、铝材的旗号，在当地一个朋友家，看到了一块铝制的飞机发动机外壳。朋友说，这是“256”飞机残骸的一小部份，曾有一港商把这只发动机的内芯买走了。

九三年三月二十日，邬经理来到了“256”当年的坠机现场。这个地方位于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叫苏布拉嘎。“汗”在蒙语里有小山丘的意思，而坠机现场是一块狭长的相对平坦草地，可以看到不时从小山丘上来下去的成群黄羊。

朋友带领他到这块地上寻找。这里很荒凉，似乎罕有人迹。枯草掩盖着残骸，寒风一吹，枯草尖叫着倒下。他发现还有一些大块残骸，其中起落架和轮毂就约有数百公斤重。另外在以坠机中心为圆心差不多五公里的范围内，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碎片。从现场看，确实有一批铝皮被撬走了。

当地根本找不到起重设备，邬经理赶紧雇车找人，把起落架等沉重的大件先搬上车。这些东西很沉，要十几个人才抬得动。后来他干脆又雇请了二十几个当地小孩，把附近所有碎片全部收集起来。孩子们的工作很有成果，他们甚至不放过隐没在草丛中的螺丝。他又把朋友手中的发动机外壳也收购来了，这些残骸总共有3至4吨重。

邬经理与蒙方签了一份有关事宜的意向书后，迅速离开了那里。

#### ◇ 大漠孤烟

邬经理选择了最简捷的回归路线。从温都尔汗经布尔根、乔巴山继续向东北，过哈比日戈口岸回国。

车和司机是从当地雇请的，车是一辆老吉尔卡车。为了不让残骸太显眼，他们又寻找了一个运废铁板同行伙伴，把残骸分成两部份，装在车上，又把废钢板分盖在两车残骸之上，算是个掩护。

他们选择的路线没有公路，汽车时而在蒙古大戈壁的砾石上颠簸，时而在半人深的枯草丛中蹒跚。天公不作美，他们遇上了九三年那场大寒流：暴风雪铺天盖地，白色的雪烟被风卷着在草地上横扫，白天能见度极差，车前方十几米外什么都看不见，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二三十度。老吉尔车里没有取暖设备，寒风呼呼地往里钻

，车里车外温度好像差不多，他们冻得直哆嗦。

车顶着厚厚的积雪负重前行。走到半路没有油了，只能等过路车，托人把口信带出去捎油来，这才度过难关。

他们在经过 1 5 0 公里无人区时，车连续两次烧坏了离合器片，也只能等着过路车送信，再等另一辆过路车捎回零件来。受困在寒冷的蒙古草原，车上载的又是这些物品，他们被恐惧、寒冷、危险侵扰着，直到现在，邬经理还是不愿意回想那一段困苦经历。

从温都尔汗到哈比日戈，直线距离不过 5 0 0 公里，他们却走了整整 7 天。邬经理回想说，“如果载运的是别的什么货，我会把它扔在路上，可是这样重要的历史物证，我就是舍命也得把它弄回来。”

三月三十一日晚上，他们驻在距哈比日戈口岸 5 公里处，等待四月初至中旬口岸开放。临过关时，蒙方不知为什么突然禁止铝材出关，眼看着前面的车辆被扣下，邬经理急得团团转。后来他只好自己先过口岸，让车和残骸等在蒙方境内。

一等就是 1 5 天，连司机都等焦急了，几次想放弃，邬经理每天把食品送到口岸，叮嘱他不要紧张、不要焦急。其实最紧张、最焦急的还是邬经理。

四月十五日下午 5 时左右，口岸突然出现了松动，他们赶紧办理了手续，开车过关。

车轮行驶在祖国的大地上，大家悬着的心方才落地。

#### ◇ 残骸无价

邬经理把他这三吨多珍贵的残骸放在了距海拉尔不远某旗的一座院落里，残骸上面覆盖着几吨牧草。这些残骸包括：较完整的起落架、发动机部份、飞机外皮碎片、座舱设备碎片、部份机翼、损毁的电子设备、油箱残片、轮毂部份等，有些沾着被烧化的铝块。

不久前，笔者在秦皇岛拿着这些残骸的照片找到了当年曾目睹“2 5 6”飞机的几位老人，让他们辨认时，他们都说：无法辨认了，这些残骸都已面目全非了。

当年曾任山海关某机场场站副站长的马先生回忆：“那架三叉戟很大，装着三台发动机，有三四十米长，油箱在飞机翼里。那时候这可是很豪华的专机了。”

曾任机场场站参谋长的佟玉春回忆：“当时（指事件发生时）飞机停在停机坪上，我根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零点多，我看到一辆汽车冲进来，林立果下车大喊



大叫，接着林彪一行上了飞机。我看情况实在太反常了，赶紧叫来两台油车，让司机把车开上滑行道阻挡飞机，又命令两个科长每个人上一辆车，监督执行此命令。我回头看见256机组一个人（后葬身温都尔汗）正在打电话，我就大声喊他，告诉他飞机不能飞。他愣怔怔看了我一会儿，没答话。我赶紧跑去调警卫连。此时飞机已发动，情急之下我向值班员借了一支手枪，跑出来连开三枪以集合警卫。我们冲向跑道时，派去执行阻截任务的两辆汽车，一辆没进入滑行道指定地点，另一辆在道上被机翼刮了一下，事后发现机翼上的铝皮、有机玻璃灯罩、石棉绳等物被撞坏，有些碎片掉了下来，飞机冲过去后，在没有任何照明设备的情况下，违反常规强行起飞了。我之所以下令派出油车阻止飞机起飞，是因为我得执行没有周总理等人指示不能放飞的命令，而且当时此机是违规起飞，这种反常现象也使我不得不这样做”。佟玉春等人眼看飞机飞走了。约两小时后，温都尔汗便传出了举世震惊的爆炸。

在温都尔汗时，邬经理还找到了当年的一位目击者，这位年迈的目击者简略地回忆，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他正在值班，忽然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他出去一看，一架起飞的飞机正往下掉，后来听说上面的人全死了，其中有个中国大官。此后残骸就一直留在苏布拉嘎。

这些面目全非的残骸，让它的收藏者邬经理费尽了心思。谈到残骸时，他的话处处显露出他是一个有心人。

“我认为‘913’事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而‘256’飞机残骸是这个事件中的重要物证，特殊的原因使它始终不能被收藏起来。作为一个中国人，把这样一件物证运回国并能收藏起来，不论吃多少苦，付出多少代价，值得。”

九三年将“256”飞机残骸运回后，邬经理立即严密地封存起来，他不愿意为名利而张扬。曾有一个姓黄的台商开出了6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要求收购这些残骸，邬经理一口回绝了。他说：“如果是为了钱，我可能不会费这么大的劲舍着命去收藏这些残骸”。

原中国航天航空博物馆馆长薛培森听到消息后曾赴海拉尔进行考察，在仔细调研后，这位专家确定这就是林彪出逃时所乘坐的三叉戟机残骸。他说，这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不能随意处置。

为了研究和更加了解“256”飞机骸，邬经理投入心血收集了大量有关“913”事件的资料，把他们分门别类地整理清楚。为了避开可能出现的购买者们的纠缠和不必要的麻烦，一向豪爽而好客的邬经理不得不封锁消息，把这些残骸秘密地收藏起来。

“256”残骸作为“913”事件的物证和重要历史文物，它的意义当然是特殊的。新闻界日渐将收藏林彪出逃座机残骸的消息曝光后，邬经理决定不再将残骸长期

冰封。他曾有过一些打算，他想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256”残骸的作用，让残骸在合适时机、合适的地点浮出水面，起到教育后人的作用，同时也能更妥善地保存起这件文物。

邬经理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在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的金帐汗旅游部落展出。在旅游部落设一个展厅，把残骸分类摆放，同时配上“256”三叉戟复原模型，再把“913”事件的历史背景等材料制成图文并茂的展牌。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展厅将在富有民族气息的金帐汗旅游点里落成。

邬经理还考虑：选择上海作为展出地点，展览的名字就叫“折戟沉沙”，具体的安排目前尚未确定。

邬经理曾委托一位密友了解秦皇岛情况。邬经理认为，秦皇岛是个旅游城市，每年夏天数百万的旅游人口，在这里办展览，教育面更大，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这样既可以给这个城市旅游增加新项目，又可以使残骸得到更妥善、更科学、更安全的管理。同时，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那就是“256”号三叉戟当年就是从这里走上了出逃坠毁之路，选择秦皇岛更深层次的意义亦在于此。邬经理希望能够在秦皇岛首展。

究竟林彪出逃座机“256”三叉戟残骸在哪里展出，至今尚未定论，但关于残骸展览的新闻将会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

□ 摘自《紫荆》杂志1998年11期

~~~~~

【小心求证】

知情人反复查证林彪死因

• 肖思科 •

1971年9月13日，发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的一次空难，震惊了中国政坛。不久，以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经调查，公布了调查结果：中共党章法定接班人、在中国政坛上位居“二号人物”的林彪元帅，企图篡党夺权，在阴谋政变未遂的情况下，仓惶乘机外逃，不料机毁人亡。

此事在10年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又组织了庞大机构进行了复查，最后对这个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案件，进行了历史的审判。两次调查，结果一致。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大约在林彪事件至今的30年里，海内外有以“知情人”、“未亡人”和“研究专家”为名的人，提出了林彪系“导弹击毁说”、“西山镇

压说”、“绑架出逃说”、“替身代死说”和“软禁老死说”等种种谬传。无疑，林彪的死因只有一个！笔者追踪和关注此事十余年，提笔回眸，将觅踪30年的一些粗略看法告知读者。

◇ “西山镇压说”

1993年初，号称为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揭开林彪死亡之谜》的专著，作者自称姚明乐。书中将林彪之死归为毛泽东“最后的晚宴”，其核心内容如下：

毛泽东决定与接班人林彪分手，让掌管中共中央警卫局的汪东兴安排二人在“玉泉山”见面。宴罢，林彪座车从玉泉山返回，伏兵出击，林彪呜呼！

大意如此。这大概是关于林彪之死与中共中央公布结果有悖的公开专著最早在国内出现。然而，此说法早在国外流传……

此前10年，也即1983年初，在美国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一本署名姚明理（Yao ming le）、十多万字的《林彪的阴谋与死亡》。同年6月，台湾也出版了由莫绍平、傅依萍译成中文的该书。香港远东出版社将此书改名为《林彪之死》出版。

此书由美国记者、“中国通”史丹利·大诺撰写评论推介。该书引用不少所谓中共高层秘密文件及其一些回忆录，所要揭发的内幕是：林彪试图引发中苏大战，以便夺取政权；林立果承诺袭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由于举棋不定而失败；林彪是赴毛泽东晚宴之后被击毙；在外蒙古机毁人亡的是林彪“小舰队”等等。全书一个意思，无非是中共中央公布的结果不实。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笔者一经研究，便发现此如泡沫，一点就破。

首先，据笔者对照“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揭开林彪死亡之谜》，与海外出的三个版本如出一辙。无非在作者名上的翻译有“姚明理”和“姚明乐”之别。而《揭开林彪死亡之谜》基本上是“移花接木”。该书共计288页，而其中181页至262页系抄袭笔者专著《超级审判——图们将军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的部份章节。此书真伪读者自然明知。

其次是在海外出版该书的作者姚明理通篇除引用中共中央公布的三批林彪专案组材料之外，其异说完全是引用“中共高干”赵研极的回忆录。据笔者调查，中共中央系统，中央公安部门和解放军系统的高级干部中，无一人叫赵研极。而这作者“巧妙”就在于“赵研极开始写回忆录时，健康情况已经很坏，还没写完就死了”。死无对证，这正是作者的用心。

再次就是时间上的矛盾。该书稿称1971年9月12日晚，毛在“玉泉山”

与林彪举行“最后的晚宴”。据笔者了解，毛泽东南巡于1971年9月12日到达丰台站，并召集李德生等人作了指示，晚上直接回到中南海。据李德生、陈先瑞将军和中央警卫局邬告成副局长透露，毛泽东当晚根本没有到“玉泉山”。而从另一个方面证实，林彪当晚根本不可能到“玉泉山”，而在北戴河。笔者调查数人，特别是林彪的贴身卫士长李文普证实，林当晚没离北戴河半步。此事单从时间上就不攻自破。

◇ “导弹击落说”

别有用心的姚明理在揭发所谓内幕时，对林彪专机坠毁有一种说法：在外蒙古机毁人亡是林立果“小舰队”成员，而该机是导弹击中后坠毁。

无独有偶，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人员在飞机坠毁的现场调查后，带回一张照片，也有飞机翼上有一洞孔之说。这两点不谋而合，曾被人怀疑飞机是用导弹击落。

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在《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一文中已讲得清楚：总理向毛泽东汇报了林彪叛逃之事，毛泽东当时表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是没办法的事，随他去吧！可见老人家并不想置林彪于死地。

前不久，空军司令员王海将军撰写回忆录，其中提到他根据周总理指示，成立了一个专业班子论证林彪专机出事原因。其中提到洞孔问题，他们认为是机翼中电路起火引起爆炸。他们从技术方面得出结论：如果导弹击落，则洞孔应当穿透，而所谓洞孔实际是呈单面炸开，而铝刺外翻，从这一点证实，该洞孔并非导弹所致。

此事除王海将军等提供的结论外，当时从蒙古回国并带回照片的驻蒙使馆人员孙一先也在回忆中证实：当时提供这一洞孔情况，主要是林彪专机坠落地点，离苏军驻蒙基地很近，怀疑有苏军发射导弹的可能。而提出此问题后，经周总理指示，与中办负责人之一杨德中、外交部军代表李耀文将军等，在事后很快找了一架与出事专家同样的飞机进行了现场分析。当时就否定了“导弹击毁”的怀疑，因为不仅铝刺外翻，系内部爆炸所为，而他亲眼见了飞机内部结构，证实了电路引起油箱爆炸的使然。

此事笔者在近十年来，反复请教了弹道和导弹专家，他们几乎同一种结论，那就是在当时，中国导弹要把蒙古温都尔汗的飞机打下来几乎不可能，因为当时装备的导弹还到不了200公里的射程，而中国离温都尔汗则有1100多公里。

本来此事已经清楚，但前不久在台湾的一本专著《谁杀了林彪》（作者王兆军）又重提旧事。而且将这一说法嫁祸当时全权处理林彪事件的周恩来。好在周恩来生前对此已有留言。

当时，周恩来在广州的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上讲：“我再说一遍，林彪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一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能命令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啊！我如果命令打下来，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待啊？！”

总理的话说得合情合理，当时在场有数十人作了笔记。

◇ “绑架出逃说”

在林彪出逃死亡的诸多说法中，“绑架出逃说”最有市场。此说甚早，而且是出自林彪的亲人之口。笔者近年对此特别关注，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林彪被绑架的理由。

中央军委法制局前任局长、林彪案审理办公室负责人之一图们将军曾给笔者透露了这样一段往事：

那是1981年初，也就是全国人大决定成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审判厅的工作宣告结束时，“两案”办公室收到一份林彪直系亲属的信，声称林彪是被叶群及林彪反革命集团“小舰队”成员骗上飞机外逃的。也就是说，林的叛逃是被绑架的。

为此，原特别检察厅副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史进前将军专门指示由当时林彪案件审理部门组织了一个班子，进一步做了调查。

据查，写信的当事人对林彪“被骗上飞机”的说法由来已久。1971年9月12日晚，她在向驻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局部队报告情况时，就说：他们（叶群、林立果等）要把林彪“弄走”。1971年11月，当事人在写给中央的材料中，仍然保持了这种说法。而在中共公布57号文件之后，当事人就一改常态，先后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拥护中央“对林彪等叛国罪行的批判和结论的完全正确”，并声称“几年前就知道林彪要搞阴谋”。

而到了1979年11月初，她给江西省一名前要员写证明材料时，又冒出了林彪是“被骗上飞机”的说法。

无独有偶。与这位当事人的提法同出一辙，一位在海外的“九一三事件”中的“未亡人”也同时呼应，在其《自己写自己》的书中，用更加奇怪的细致的情节和推论，说明林彪是被林立果和叶群劫持而逃。

据笔者反复考证，此说难以成立。首先，林彪在出逃前，也就是在9月初，就在同叶群、林立果密谈并设计下一步的行动。比如内勤就曾听到的一些只言片语：

“他们会盲目执行的”；“说我是特务，叫我到农村没有安眠药怎么办”；“各大军区都不会跟你走的，许世友是跟毛主席的，也不会跟你一条心”；“没想到小小林立果活动面那么大”；“黄吴李邱……你都交给我嘛，到香港就好办了”等等。

这些话系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在密谈中的对话，内勤人员大部份都是在有意（其中包括受当事人安排）中听到的，应有一定的真实性。其次，从林彪下达的“九八手令”上看，林彪是主谋，是知其核心的。

1971年9月8日，林彪反革命集团准备发动政变。林立果赴北戴河之后，拿回了林彪“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命令办”的手令。而林立果正是用这一“手令”布置了“小舰队”政变，同时骗取了空中交通工具。而后，周宇驰也是用这一“手令”骗取直升机外逃。

关于林彪“手令”问题，前一段也有人提出质疑。据笔者了解，在林办确有一个李姓打字员能模仿林彪字体。但此事可能性不大。因为在特别法庭鉴别特征时，有字迹专家已鉴定那张“手令”出自林彪亲笔书写。而笔者也曾将“手令”残片复印件和林彪书法复印件提供给一位字迹鉴定专家朋友，他提出的结论与特别法庭相同。此事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字迹鉴定已成为平常之事，若有疑问恐不难解决。

再次，这几年笔者数次访问了林彪出逃的目击证人李文普等人。李还是那句话：林彪上车后问“到伊尔库什克有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而不少看见林彪出发时的证人也有描述，证明是林彪自己走的：

“……等司机杨振刚把车开上来，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就从屋里走出来。刘沛丰提三四个皮包先上车。接着是叶群、林立果上车，林彪最后上汽车，林走到门口还问内勤：‘东西都装上没有？’没停步，很高兴的样子，帽子未戴，大衣也未穿……”

从这一情况看，林彪上车并无绑架迹象。

林彪叛逃苏联，李文普的证词无疑是核心。也有人说是孤证。其实这个证据并不孤立。最近笔者找到在“九一三事件”中被周宇驰劫持直升机的机长陈士印，他告知飞机起飞后，周宇驰便拿出画有“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什克”的航线图，而此图几天前就已准备，可见林彪叛逃苏联早有其计划和准备。

那个以“未亡人”名义“自己写自己”时，描绘了飞机在北戴河上空划了一个圈，即飞机有回来之意。或者说林彪要回北戴河，是因禁空不能落地而飞苏联。据笔者同专机师长和林彪专机组幸存人员研究，那么大的飞机，根本不可能在北戴河上空划个圈。而编织这个细节，显然是别有意味的。

至于李文普，至今仍然是活着的证人，对其质疑也有不怀好意者，其中不乏是

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改变历史。李文普对此回答坚决：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笔者分析，他的证词并没有因此给他带来什么好处，林彪事件后他被下放；假若他同林彪一伙，他也没必要中途下车，而林立果也不会向他开一枪。笔者同李有许多接触，认为他的话有可信之理。

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林彪是党的副主席，要劫持绑架不是一件易事。除非他自己想走。而笔者对林彪下决心走倒有一些看法，那就是叶群和林立果提供的情况促成了他走了最败的一着棋。而叶群和林立果提供的情况恐怕值得研究。不然，聂荣臻元帅不会说“林彪坏在老婆手里！”

◇ “软禁”和“替身”说

不知从何时何处传出一条“小道消息”不胫而走，那就是“林彪软禁说”。

最早，笔者见到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学者在饭桌上讲起此事，而且很具有传奇。据这位身份不低的人说：他从公安部的一个人得到印证，林彪谋害毛泽东的事情败露后，“小舰队”乘机逃跑，而林彪被抓起来了，被公安部送到山西侯马一个山沟里关着。传言者说得很玄：林彪的胡子、头发长得一尺多长……

先姑且不论林彪死在何处，单从林彪“头发长得一尺多长”就站不住脚，因为林彪很早就有“林秃子”之称，他脱发已成光头。

再说林彪不可能不在飞机上，也不可能没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据1996年1月31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称，该杂志社记者彼德·汉纳姆曾采访了前苏联克格勃特工，他们从温都尔汗取回林彪头骨，并结合林彪在苏联的病历，从枪伤、牙齿和肺上的钙化点印证，摔死在蒙古荒原上的就是林彪。而这一点连美国和前苏联也不怀疑。

听到关于“林彪软禁说”的消息，笔者还真查渊问源，开始这个人讲是公安部的人证实的，后来问起，又说是公安部门证实的，出现一字之差。经再三追问，对方说了一个已退休的派出所民警。据找这个民警查问，他说了一番让人哭笑不得的话：

“过去刘少奇、彭德怀和贺龙都是软禁死的，我们老头儿们议论林彪的死是不是也有这个可能，别人侃山时这么分析，我也在想这有没有什么道理？！”

不用多问，谣言就是这样引起的。

还有一则“替身说”也很令人惊诧。

曾有海外小报传闻，林彪乘专机外逃，最后机毁人亡的是他的替身。而且林彪

到了苏联秘密军事基地，还在训练雇佣军。也就是说，林彪用“金蝉脱壳”到了国外，人还活着。

此事纯是杜撰之说，关于林彪是否有替身，一调查便知。

据一位曾在四野前身“东总”的老人回忆：在哈尔滨，机关的人真在街上见到一位与林彪长得很相像的人，回来后给林彪讲了，林彪只是一笑，以后再未提过此事，根本没有找过什么替身。用替身是国外的手法，共产党人还没人搞这一套。老人最后说：“准是外国电影看多了！”

这位老人的话在林彪贴身卫士长李文普处得到印证。李跟林彪数载，从未听说过林彪有替身。他否定了“替身代死说”，他的话应具权威性。因为他是最后见到林彪叛逃的目击者之一。

另外，事实证明林彪死在荒原上并非替身。而假若真在苏联秘密军事基地，也随着前苏联解体早已曝光了。而现实已经真相大白，从没人见过林彪还活着。

◇ 历史正论不容置疑

关于林彪之死说法很多，真正的原因肯定只有一个。

早在事件发生不久，中央分三批公布了事件情况，早期报告中有些情况让人质疑是有道理的。例如说林彪与苏联勾结，这是没有依据的。而更重要的是，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林彪集团与“四人帮”有勾结，也有内讧，人们怀疑材料真实性是有原因的。

正是八十年代到来之际，邓小平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使许多问题得以还历史本来面目。而在这时，中央成立专案组重新复查林彪案件，并对该案进行审判，应当说这时的审查报告和审判判决是公正的。

两次审查，一次审判，结论都是一致的：林彪集团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试图“和平过渡”未果，但阴谋政变又未遂，最后乘机出逃摔死在异国他乡。这个结论则是建立在详尽的事实基础之上。

笔者认为，至少，在目前一些传闻得不到证实，也拿不出证据的情况下，林彪的死因只有一个，就是官方公布的结论。

□ 摘自《北京青年报》2001年09月11日

~~~~~

【史实辨析】



## 周总理处置“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一些情况

• 于 南 •

周恩来同志在处理举世震惊的“九·一三”事件中，表现了高度的党性原则和斗争艺术。现在，对周总理处理林彪叛逃国外逃事件的过程，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在256号专机越出国境，林彪确已叛逃后，周总理才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报告的。有的讲周总理在九月十二日以前，已经掌握了林彪的政变阴谋。有的文章对此事交待的也不够清楚。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些重要情节，是应当弄清的。

据我们向有关人员了解，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夜里发生的情况，大体是这样：

那天晚上，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十点半左右，接到8341部队负责人的电话说，根据林立衡的报告，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坐飞机逃跑，北戴河林彪住处，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总理当即给吴法宪、李作鹏打电话，要他们查明究竟有没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

在总理已经掌握了山海关机场确有一架三叉戟飞机的情况以后，十一点半左右又接到叶群电话，她对周总理撒谎说，林彪想动一动，还没有调飞机来。事后，总理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听到叶群的谎话后，判断出林彪他们有鬼，可能要跑。总理立即给吴法宪、李作鹏下命令，断然采取了一些措施。

十三日零时左右，周总理接到8341部队电话报告说，林彪一伙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已乘车从北戴河逃往山海关机场，并开枪打伤了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总理感到情况十分严重，立即从大会堂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报告。因为周总理知道，毛主席是十一日下午乘火车离开上海，十二日下午两点到达丰台，找了一些负责人谈话，五点左右从北京站下车后，回到中南海。年近八十的老人，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旅途，是很劳累的。在北戴河那边的情况，还没有完全弄清以前，周总理一直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处置，深夜不便去惊动毛主席。在得知林彪已乘车逃往机场，开枪打伤人的情况报告后，就立即去向毛主席报告，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同时派杨德中同志到西郊机场“协助”（实为监视）吴法宪指挥。

十三日凌晨零点三十二分，林彪乘坐的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后，下令开动雷达，追踪这架三叉戟专机。在快要飞越国境时，吴法宪来电话请示总理，打不打？总理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有法子的事，由他去吧。这时已将近凌晨两点。

不久，三点多，又接到吴法宪的报告说，从沙河机场飞跑了一架直升飞机。周总理当即下令，派战斗机拦截，绝不能让它飞出国境。后来直升飞机又飞了回来，怕它到城区闹事，总理又下令迫降，如进城就坚决打掉。

当时，周总理还没掌握林彪一伙的全部阴谋活动，不知他们到底能干出些什么罪恶勾当。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以防万一，总理劝毛主席到人民大会堂暂住。毛主席要总理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随后，毛主席乘车从中南海出来，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住下。

三点多，政治局委员来到人民大会堂以后，周总理首先告诉他们，毛主席已在十二日傍晚回到北京。接着，向政治局委员讲了夜里发生的一切情况，说林彪坐飞机跑了。作了应付万一出现的各种情况的准备。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

十四日下午，周总理得到我驻蒙使馆的报告，才知道256号专机，已在十三日凌晨二时半，在蒙古境内坠毁，机上人员，八男一女，全部摔死。总理报告了毛主席，并告诉了政治局委员。

九月二十四日清晨，周总理去机场为李先念同志出访送行。回来以后就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宣布，中央决定，要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黄、吴、李、邱一个个被押走。

这个过程如有叙述得不够准确之处，欢迎了解情况的同志加以补充、更正。

□ 原载《党史研究》1981年第三期

~~~~~

【史实辨析】

是周恩来不让外逃的林彪返回着陆？

• 周敬青 •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在其发动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强行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的草原上。这就是九一三事件。这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九一三事件尤其是飞机坠毁的情况，成为国外新闻媒介议论的一个热点。

近些年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引用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较近的一篇非官方文章认为，三叉戟飞机实际上首先往南飞了约10分钟时间，然后掉头返回山海关，但发现山海关机场已遵照周恩来指示关闭。该文暗示，是周恩来不让林彪着陆，以迫使他飞往苏联，这样他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国家的叛徒。”

无独有偶，国内最近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中也写道：“飞机起飞后20多分钟，留在96楼‘林办’人员听到飞机返回的声音，96楼的人都聚集在坡顶向机场方

向遥望，只听得飞机在机场上空轰鸣盘旋，大家都认为飞机飞回来了，一定是想降落。当时‘林办’的人已离开机场，谁都料想不到中央在飞机起飞之后下了封锁机场的命令，地面所有灯火熄灭，飞机无法降落。”“飞机向莲花峰飞来，在96楼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大家仰望着它，最后见它在空中划出一个形似问号的线路，然后向北方飞去，再也没有回来。”

这两段话的用意是说林彪在空中仍不想北去苏联，下令返回山海关机场，是周恩来下令关闭机场才无法降落，不得不向北方飞去。其实，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三叉戟客机时速超过900公里，怎么可能像小飞机那样在北戴河的96楼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呢？飞机起飞的山海关机场距北戴河有百里之遥，肉眼根本看不见，又如何“向机场方向遥望”，还能听到“飞机返回的声音”呢？这真是太富于想象力了。

在林彪乘机强行起飞后，周恩来曾代表中央政治局下达过禁空令，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第一，这个禁空令是何时下达的，当时林彪的飞机在何处？第二，林彪专机起飞后，党中央的态度是要他回来，还是要赶他走？第三，林彪是否有要求降落的表示？我们不妨对有关这一事件经过的更多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以便了解历史的真相。

《周恩来传》的记录如下：“对林彪等突然乘机逃走的意图，当时还不清楚。对他们的全部阴谋计划，一时也并不了解。周恩来命令李德生坐镇空军司令部，监视飞机动向；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派纪登奎去北京空军司令部，以便从各方面掌握情况。同时，他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周恩来还请调度员用无线电向这架飞机呼叫，要林彪等飞回来，告诉他们：不论飞机在何处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

对林彪事件颇有研究的专家于南教授在《关于林彪事件若干历史问题的考察》一文中也谈到：“周恩来随后从人民大会堂赶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汪东兴、张耀祠也几乎同时到达。周恩来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雷达监视这架飞机，并与机上通话，告诉飞机可以在任何一个机场降落，但256号飞机不回答。地面雷达不断报告飞机的航向、时速和高度。飞机耍了个花招，开始时航向290度即向北京、大同方向飞，但十几分钟以后，在零点46分改航向为310度，向蒙古的西部即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偏东一线飞行。”这些都说明，林彪乘机起飞后，中央的态度是要他回来，所以才从地面不断向这架飞机呼叫。而且，周恩来表示愿意亲自到机场接他，这也算仁至义尽了。

但是，关键的问题还是“禁空令”是何时下达的呢？现在我们有幸找到当时亲自用电话向全国下达这项命令的当事人的准确回忆和电话记录，成为解开这一疑团的最有力的证据。当年军委空军指挥所的值班作战参谋朱秉秀，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曾协助李德生参与处理这一事件。他详细地记录了自己在空军指挥所亲历这一事

件的始末：“周恩来指示，要空军指挥所直接用对空台与潘景寅（林彪飞机驾驶员）沟通联络，要他飞回来。北京西郊机场和首都机场都可以降落。此时，吴法宪也在西郊机场指挥所亲自手握话筒不断地呼叫潘景寅，告诉他只要回来，一切都好办。但是，始终没有听到潘的回答。眼看着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1时50分飞出了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并在逐渐下降高度，直到我地面雷达上的飞机信号于温都尔汗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同时还示意我赶快拿笔作记录，一句一句地复诵着电话里周恩来传达的政治局命令：

‘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记完后我又向李德生复诵了一遍。他说，没有错，这就是净空了，空中发现情况就是敌机（由于林彪出逃当时是绝对机密，命令下达后所及的人将很多，所以在命令上不能不出现林）。梁（指梁璞，当时任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同时对我们两个作战参谋说，赶快向各军区空军、指挥所传达。我与徐心德（当时任作战参谋）分工，由他接通电话，由我传达命令，流水作业。从1时56分到2时20分左右才将周恩来下达的政治局‘禁航令’传达完毕。”

是周恩来直接下达命令给山海关机场，那也只能是在1时50分左右，距林彪起飞的零点32分，已经是1个多小时之后的事了。把不能降落归于1个多小时后才发布的命令，不是有点荒唐吗？实际上当时林彪的飞机已经在国境线了。而且，这架飞机的航迹有地面雷达航图为证，可以确凿地证明根本没有返回欲降落。

□ 摘自《党的文献》1999年第4期

~~~~~

【发微探幽】

“九一三”事件余波——周恩来嚎啕大哭

• 周秉德 •

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越来越多在伯伯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已双鬓斑白，也大多步入古稀之年，住进了干休所，迈入了离休干部的行列。可是，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仍使他们无法忘记过去的日子。他们口头讲，挥笔写，使伯伯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公布于世，让我的心灵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震动，使我一步一步进入到伯伯内心世界，使我受到了一次次强烈的震撼！更使我掂量出伯伯苦涩辉煌的份量。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消息一经证实，有人立即提出用导弹打掉。毛泽东主席摇摇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而伯伯曾拿着话筒向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喊话：“林副主席无论在国内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去机场迎接。”接着，为了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伯伯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这是许多文章都回忆过的。

有一个情节鲜为人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

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不断有面色严峻的国家领导人脚步匆匆进出于人民大会堂，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

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爆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爆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

自从调到中央工作，纪登奎看到的周恩来永远是从容、镇定、乐观。是的，如果从身材长相上看，周总理只算是中等个，人偏清瘦，典型江南人的脸庞，端庄清秀，举止文雅，让人不禁联想起西湖边的杨柳。可是，从跟随他工作中的亲眼目睹，不管是外交上的剑拔弩张，还是党内错综复杂的局面，他永远应付自如，有用不完的智慧 and 精力！而且，他仿佛是专为克服困难来到这个世界的，往往越是困难、艰险，他越有力量和办法，仿佛世界上没有难得住他的事。又让人不禁想到扎根于绝壁陡岩上的黄山奇松——美感与力量最有机的结合。像今天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他，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

“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

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确实，纪登奎也是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真正想明白周恩来的痛哭失声：为着树立和维护林彪副统帅的地位，冲击打倒了党政军那么多老干部，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国从上到下，几乎无一幸免，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叛徒、内奸、工贼”，煤炭部长张霖之被活活打死，多少老干部被投入监狱，多少群众因之划线受批判……如今，这个一直是被称为毛主席“最亲密战友”，并作为毛主席当然接班人写入党章的林彪，竟带着老婆、儿子逃往国外，落得个折戟沉沙，死无完尸！作为一个国家总理，他怎么不为“文革”以来党的一次次错误决策痛心！怎么再说以打倒刘少奇大树特树林彪为主要成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又怎么向全国党、政、军、民解释和交代这一切？！

毛泽东主席之气魄够大，他在延安时就笑指拥有原子弹的美国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但林彪外逃之时，毛主席已是年过古稀老人，林彪外逃之事，给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致命的。

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伯伯，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灰白，他挥挥手说：散会散会！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往电梯方向赶。卫士长张树迎扶着伯伯走进电梯，他明显感到总理的全身在发颤：“到游泳池。”他的声音也微微发颤。张树迎心里一震，一定是毛主席那里出事了。果然，一进游泳池，毛主席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主席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经到了，只是冷漠地远旁站着。伯伯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这句话，站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听得清清楚楚，他内心无限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至今张树迎还仍常对我感慨：你伯伯一直维护毛泽东主席的地位，你说他崇拜主席，尊重主席，也是为了党！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总归得有个头儿吧！

□ 摘自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著《我的伯父周恩来》（铁竹伟执笔，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吕青（加拿大）

《CND》总编：  
熊波（美国）

---